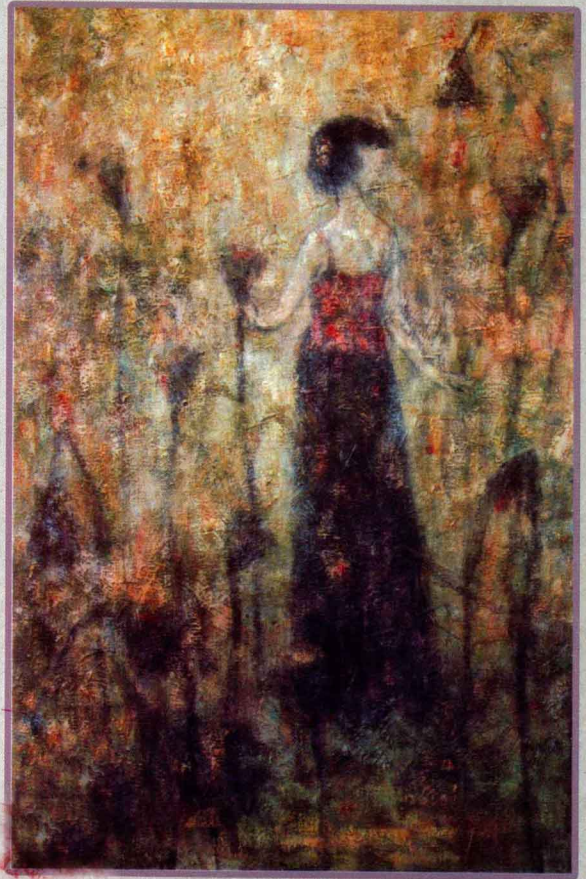


2008.2

芙蓉江文藝



遵义市正安县文联主办

尹珍故里·小说之乡·尹珍故里·小说之乡·尹珍故里·小说之乡·尹珍故里·小说之乡

芙蓉江文藝

二〇〇八年第二期

(刊名书法: 韩继忠)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正安县文联主办

《芙蓉江文艺》编辑委员会

- 顾问：韦圣福 宋霖 李广勤 曾润素
- 主任：吴桂兰
- 副主任：罗遵义 李易超
- 编委：李易超 王龙 熊志勇 李云翔
杨欧 陈智武 王晓龙 雷霖
吕强 秦丰 肖潇 陈立航
文晓莉
- 主编：李易超
- 副主编：王龙
- 编辑：陈智武 雷霖
- 通讯地址：贵州省正安县文联
- 联系电话：(0852)6426856
- 电子邮箱：lyc2812@sina.com

芙蓉江文艺

2008.2

(总第 19 期)

目 录

报 告 文 学	2 留守的知青部落	罗 文
小 说	32 天五照	骆礼俊
	56 味道	骆礼俊
	62 激情午餐	王力东
	65 希望的土地	陈立航
	67 南方有嘉木(组诗)	许雨松
	70 醉茶谣	刘新宇
	71 一朵开放在马刨井的茶花(外一首)	王 芳
	72 妹妹别哭	彭 琴
	72 采茶姑娘(外一首)	屈宁丽
	72 走进吐香坝	李英华
	73 采茶的孩子在春天的土里	杨 涛
	珍州诗社茶 文化采风专页	

芙蓉江文艺

2008.2

(总第 19 期)

关注汶川地震	74 手	邓世兴
	74 五月 震灾时节	刘新宇
天楼山采风专稿	75 天楼山记行	王小龙
	77 神秘天楼	冯其沛
曲 艺	80 天使之恋(小品)	姚明钰
	96 茶山新歌(歌曲)	李云翔
文学评论	83 小说需要陌生化和可能的极限	王 华
	87 骆礼俊和《天五照》	雷 霖
校园文蕾	88 正安二中银杏文学社作品选登	
封 面	油画: 荷塘	青 寰
封 二	“环保杯”摄影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封 三	县文联活动剪影	秦丰、周文丽
封 底	油画: 红果	青 寰

尹珍故里·小说之乡·尹珍故里·小说之乡·尹珍故里·小说之乡·尹珍故里·小说之乡

芙蓉江文艺

二〇〇八年第二期

(刊名书法: 韩继忠)

正安县文联主办

罗 文·报告文学

留守的知青部落

知青一代作为特殊群体，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事都非常感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和责任关心他们，弘扬人间真情。

——摘自2007年10月23日李长春同志在全国首届知青文化节上的讲话

1965年，上海、浙江、山东、河南、重庆、广西、贵阳和遵义等省、市区的350名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农村去”的号召，陆续到现在的正安县班竹乡上坝茶场（上坝茶场的前身是国营上坝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40年过去，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里时，会惊讶地发现，40年前从各地来的410名知识青年中，竟还有114名当年的知青仍在这里艰难地守望着。

为了生计，为了儿女，如今，这留守上坝茶场的上百号家庭在茶园生产的淡季，只好拖着老弱病体远离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奉献了一代青春的第二故乡，去江浙一带当“工人”，去正安县城拉板车、捡垃圾、修鞋补锅，稍有点积蓄的，就起早贪黑，搭乘农用车去周边场镇“赶溜溜场”，靠贩卖小货营生……可一到茶园生产的季节，他们又纷纷从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的地方赶“回家”来，又投入到紧张的茶叶生产中去。

其实，几乎所有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都有同样对故乡的感情纠葛，千方百计希望回到生养了他们的故土。而偶尔回到故土，环境和人情世故的巨大反差在他们内心深处滋生的惆怅和酸楚却无法让他们弃离——他们这是怎么啦！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如何在差异巨大的环境之间找到平衡和归宿？对于他们来说，“知青”又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让他们如此惧怕而又无法舍弃？

一位在农业部门工作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单位组队到上坝茶场搞了一次调研，他用电子邮件发了一份调查报告给我，很希望我能挤点时间到那地方去走走，去看看。我承诺了。

2007年9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这海拔1500米的班竹乡上坝茶场。114名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妻儿老小共300余人集中居住在上坝茶场的几个生产队里。上坝茶场的场长欧建学说，曾在上坝茶场当过知青，现在在《遵义日报》当记者的李贵生“回家”采访的《114名老知青的守望》报道在《遵义日报》刊载后，立即引起了遵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现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对此专门作了批示。遵义医学院接到领导的批示后，立即组队到上坝茶场，为留守的知青部落开展义诊，义诊的结果令人惊诧不已——80%的知青都患有风湿性疾病！但他们依旧从事着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的生产和生活！

上坝茶场的副场长邱本志留着眼泪告诉我，与他一道来上坝茶场的贵阳知青王晓静是一位多才多艺姑娘，她的家庭条件不错，父母亲在某文工团工作，可不幸的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回城，就匆匆的带着上坝茶场的三尺黄土走了。如今，每年的清明节，王晓静的亲人都要从贵阳来上坝茶场，给她扫墓……

红籽堡

习惯上称呼的上坝茶场最先的名字叫“劳改农场”，场部所在地设在现在的班竹乡上坝村红籽堡。

农垦上坝茶场曾是一片高寒、荒芜的土地，地处务川、正安、道真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虽然这里的平均海拔在1500米左右，却是黔北高原并不多见的、宽阔的高山平地。春夏两季，是这里最美的季节，方圆近20平方公里的山野中，鲜花遍地，花香诱人。冬天一到，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描述红籽堡就一点也不言过。

1952年，贵州省公安厅选中了这块方圆近20平方公里，偏僻、高寒、荒无人烟的山顶，开始兴建劳改农场。

一条泥淋的山间公路由正安县城出发，途

径现在的和溪、土坪、流渡、中观等乡镇的大山深处后，才爬到云雾缭绕的红籽堡。劳改农场建成后，一队队犯人陆续从四川、重庆、贵阳等押送而来，浩浩荡荡三千余人。他们成了开垦长满荆棘和杂草的劳改农场的第一批“主人”。

这三千余名犯人共分成五个生产队，散居在相隔较远的山沟里。仅有的两个进出口设在垭口上，其实是设置的瞭望哨。

通往红籽堡的几条山间小路，进出的人行动都很诡秘，使本身就神秘的红籽堡，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犯人们筑泥巴墙，盖茅草顶，开始建设他们的“家园”。山顶上那三幢成π形的房屋，所用的火砖和瓦片就是从几公里外的一个砖瓦场运来的。当时没有公路和专门的运输工具，三千余人排成一条长龙，接力传砖递瓦，砌成了当时的场部办公楼，至今残存着。

1957年，一股国民党残余势力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从空中投下了雪片似的传单，至此，劳改农场经常爆发骚乱。1958年，特赦了大批犯人，余下的也都悄悄的转往了贵州平坝。从此劳改农场更名为“国营上坝农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营上坝农场就到各地招民工，继续到贫瘠高寒的荒原上从事粮食生产，并且每年还为国家上交五十余万公斤玉米和稻谷等粮食。

红籽堡，因为特殊的地理优势而被选为劳改农场也就顺利成章了。而后来又当选为解决城市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和“就业”的最佳去处也无可厚非。

从1965年开始，就陆续有来自上海、浙江、山东、河南、重庆、广西、贵阳和遵义等省、市（区）的知识青年入驻国营上坝农场，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使命

2007年9月1日。

大清早，正安县城沐浴着阳光。我们穿着短袖T恤和凉皮靴出发了。客车沿着通向班竹乡的通乡水泥路，一股劲儿的往大山深处钻。车到九道拐，漫山的薄雾覆盖了天楼山麓的沟沟壑壑，就连最雄伟的天楼山主峰也变成了矮子。薄雾几乎要湮灭她。不到两

个小时，客车到了班竹乡。一到班竹乡，仿佛就进入了冬季，天空收起了笑脸，雨点乱了节拍地乱洒。通乡水泥路走完了，可还要爬行七公里多的泥泞公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上坝茶场呢。

又上路了。一路上，冷风开始裹着冷雨，一个劲儿地往玻璃窗上撞，总想要找个缝儿钻进车厢似的。极像一个人憋闷极了，很想找个地方宣泄一番，以求平衡。

越往高处走，冷风越裹越紧，冷雨越大。不知不觉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曲子也越听越明，越听越响，越听越亲切。

从在一栋破旧的房屋的屋檐口上挂着一个高音喇叭，曲子是这里传出来的。高音喇叭下面的墙壁上，是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时的一幅黑白剧照。剧照的左面有这么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青年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由城市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南泥湾》、《我们走在大路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已经在上坝茶场唱了四十余年。曲子的旋律已经从最初听起来很鼓舞人心，到现在的一听就能唤醒了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对流经岁月的苦涩的回忆！

来自全国各地的410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来到这里。至此，居住房屋自己建、吃饭粮食自己种的再教育生活开始了。在特殊环境中，知青们一边挤住窝棚，一边自建“干打垒”（筑土墙房子）住房。同时，还投劳开荒种粮、种菜、养牛、养猪、养羊……

如今，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这样描述他们当时的生活：

吃的是大食堂，
端着是苞谷饭，
喝着白菜汤，

住着干打垒，
睡的是床挨床，
洁白羊毛交外贸，
金黄玉米作国粮，
人人无怨言，
歌声处处扬……

上坝茶场的冬天，给知青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这里的秋冬，风吼如狮。大雪封山的时候，电线立即就变成了手臂般粗细的冰凌。山垭口上的树木一律向南偏斜，树枝上的冰挂足有一尺多宽。知青们住的房屋太简陋了，哪怕只有针孔大小的透风眼，也能听到尖利的吼叫声，屋檐下，常常是锋利的冰刀，一挂就是几个月。对此，知青们没有丝毫的怨气，相互依偎在煤火堆旁，蜷缩在被窝里，凭着人挤人的热量，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冬天，捱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

知青们为了生活，他们发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精神。他们头顶烈日战酷暑，脚踏冰雪战霜寒。他们唱着“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他们挥刀披荆斩棘，挥锄拓荒种茶。白天，满山红旗漫卷，机声隆隆，歌声一片，近岭连着远山；夜晚，时断时续的柴油发电机送出的昏黄灯光下，这群年轻人讲着家乡的故事、唱着故乡的小曲，一直要热闹到月上中天，终于在原始的荒原上创建了三千六百余亩的密植免耕茶园。

这时，上坝国营农场又更名为上坝茶场。时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从1978年开始，在知青们的艰辛劳动和精心培育下的茶园逐渐开始产生收益，再加上粮食生产和养殖收入，知青们在上坝茶场的日子也开始好过多了。

上坝茶场的日子再好过，知青们可始终还是眷恋着生养自己的故土。

1978年，当全国知青大返城的风潮波及到这片相对闭塞的大山时，已是大城市知青回城的晚期。

“回城”这个讯息是部分知青返家过春节带来了。这无异于给上坝茶场带来一场大地震。突然间，这里往日的宁静全搅乱了。一

时间，知青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不少人匆匆卷起铺盖卷，回到了父母的单位，走后门进了城里的工厂，还有的干脆回家坐等工作机会的到来。短短几个月间，410名知青就有一大半离开了上坝茶场。

剩下实在想不到办法，或因各种原因不能走的，也着急上火失去了心理平衡，有的甚至走上绝路，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但现实还是让114名知青留守了上坝茶场，成了一个特殊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殊部落。他们无奈地经营着大伙创建的这三千六百余亩茶园——毕竟留守一天，还要生活一天。

这里的茶叶进入了盛产期后，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生产出来的茶叶远销北京、上海、杭州、贵阳、山东、四川等省市。年产值均超了两百万元，利润也在二十万元以上，每年还可以向国家交纳三十余万元的税费，上坝茶场也因此多次被评为县、地区及全省先进企业，整个茶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老知青们常说，这是他们青春与血汗的结晶，这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价值体现。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有了较高的收入，还建起了子弟学校、医疗室、商店。

1988年，时任国家农业部部长赵凡考察上坝茶场时，高兴地说：“这个茶场是个好地方，最好是造一个亚洲最大的茶叶基地。”

……

从“上坝国营农场”到“上坝茶场”的慢慢征程中，知青们无私的奉献了青春，还有27名知青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如今，上坝茶场的三千六百余亩茶园已经老化，就像一个被挤干了果汁的芒果，已无能为力为留守上坝茶场的114名知青及他们的家庭，供给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了。

回首往事，上坝茶场的知青们的一幕幕辛酸往事仿佛就在眼前。他们痛失战友的一张张泪脸就在泪光中忽闪。他们战天斗地的一曲曲青春欢歌就在耳边萦绕，他们一场场丰收喜悦的场景就在眉宇间复舒……所有这些，融成的是一代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特殊年代的一部史书。

几十年过去了，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昔日风华正茂已荡然无存，仅有的是满

头花发，痴情守望。他们没有忘记过去，也不可能忘记过去。他们希望社会不要忘记他们，因为他们也不会忘记这个社会……

他们坚守着！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痴情的坚守着！

老照片的记忆

上坝茶场的很多建筑设施和装饰布置都很陈旧，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居住的房屋墙壁上和门板上，不少张贴画儿和书写标语都沿用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一阵子流行的东西。上坝茶场场部的办公楼翻修还没多长时间，走进那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右面的石灰墙壁上，是一幅由很多张黑白老照片组成的巨幅喷塑。重新组合的黑白老照片记忆着知青们由“国营上坝农场”到“上坝茶场”的那段艰辛历程。

一幅幅黑白老照片，凝固了知青们艰难生活四十余年的历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讲话的巨幅黑白照片被排在了首要位置，接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以及国家农业部的领导在现场的图片，但更多的老照片还是记录了当年知识青年们战天斗地的激烈场面。这些图片是当时的一位上海知青用老式120型相机拍摄的。虽然他早已离开了上坝茶场，回上海去了，但他经常眷念一同战斗过的伙伴，就特地把珍藏的老照片加洗了两套，一套像呵护生命一样自己保存着，另一套则寄了自己奉献了青春的上坝茶场的知哥知姐们。

或许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抑或是让后生们能从老照片上读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以至于每一幅老照片都附了说明，并且还在巨幅喷塑的左边记忆了关于国营农场性质和王震将军执掌农垦部的简介：

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的农业企业。它是由政府投资在国有大面积的土地上，采取最先进的科学农业技术及最新的工作方式，利用机械耕作，进行集体劳动，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完成国家和人民所给予的生产任务，并以启发引导个体小农经营，走向机械化、集体化的生产道路。

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的农业企业。它是

新中国农业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方向。它是国家在国有土地和生产手段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集体化、机械化的生产。采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最新的工作方式，不断提提单位面积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显示出先进的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并以农场本身实际经营的效果给予周围农业生产合作、互助组及个体农民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以启发引导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走向集体生产富余幸福的道路。

今后，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重视国营农场的工作，应该认识到农场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加强领导，使农场在技术上、产量上表现出优越性，带动广大农民向农场学习。

国营农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开创的。建立国营农场、屯垦戍边是党中央为发展农业，巩固边防作出的战略部署。

国营农场是处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企业。它不是简单的经济实体。它担负着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增强民族团结的历史使命，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需要，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国家大局的需要。

为了巩固和发展好国营农场，当时还有明文规定：凡农场为了自给和职工生活福利的加工产品，应予以免税。农场自修之用的公路应免纳养路费。国营农场应设立医疗机关和小学校，并根据需要逐步筹办托儿所。这些费用由主管部门提出均列入国家预算。从远景任务来说，国营农场是全民所有制，是为建成社会主义在农业领域中扩大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经济形式，是不需要再加以改造和过渡的经济形式。因此，要号召全党全国重视它，爱护它，并逐步加以发展，而不应该去破坏它，削弱它，阻碍它的发展。

1956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酝酿了一个新的战略决策，决定成立农垦部。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郑子恢就成立农垦部的事说，周恩来说了，为了搞好农垦工作，以及管好现有的国营农场，要单独成立一个部，从农业部分出来。而周恩来在谈到农垦部的成立和任务时，这样强调：“农垦”翻译外语就是“开垦荒地”。建设国营农场、管理国营企业、发展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创

立并发展新中国的农垦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边防、捍卫和建设祖国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是治国安邦的一项英明决策。

周恩来讲这一席话的时候，当时的王震将军也在场。周恩来的指示，对王震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因为在酝酿成立农垦部时，毛泽东早已把目光盯住了王震。

在毛泽东眼里，王震是个极有创造性的猛将，敢说敢干敢冲，无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王震总会开拓性地想办法克服，并能创造出奇迹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王震率领三五九旅，提出“一把锄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中央”，开赴南泥湾，拉开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序幕，就是在这块野兽出没，荆棘横生的荒地上，王震带领大家垦出了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毛泽东看过后，大笔一挥，为王震题词：“王震有创造性！”

毛泽东对王震给予厚望，希望他能再创奇迹，谱写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得崭新篇章。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调整国务院所需财经部门组织机构的议案，提出增设农垦部并规定它的四项重要任务：“增设农垦部，管理农垦移民、国营农场、军垦农场和华南垦殖等工作。”

1956年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十次会议通过此议案。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任免令，正式任命王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

就任农垦部不久的王震将军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后生，显然被眼前一幅幅黑白老照片和关于国营农场的介绍深深打动了——不停地闪动着手里的数码相机，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在不停地按，白纸黑字不停地落在纸上，一行行一页页，想要一股脑儿检录完那段流逝的岁月。

但更迫不及待的是想走进那些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生活。

他是红军的后代

正安烈士陵园内。

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有一座坟显得很

特别——那就是一进陵园大门，从第二排右起的第一座坟。因为这里安葬的烈士都是当年解放正安时牺牲的解放军，而唯独这座坟不是。这里安葬的却是一名正安人，他叫夏中华，是正安县新州镇夏家山人。

《正安县志》这样记载：

夏中华，又名李维彪。1935年，夏中华随军长征，过雪山草地途中，师长贺炳炎负伤，部队受到敌人堵截，夏中华与战士轮流背负贺师长奔跑数十里，甩脱了敌人，保卫了首长安全……夏中华在人民军队19年中，历经大小百余战，重伤五次，荣立大、小功十次；因脑神经受损，左臂麻木，左手中指弯曲，右耳丧失听力，属二等一级残废……1966年12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葬县烈士陵园。

从夏中华墓前的碑文得知，夏中华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区队长和在县民政局工作，当过老鹰关精神病院长。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夏兴忠，夏兴元。

1961年，迫于生计，夏中华请凤仪镇凉台村刘明胜代笔，给朱德总司令写信，告知其生活的窘迫。朱德总司令办公室的同志回信，叫当地政府给夏中华一家一次性解决了2000斤救济粮食，并特地叮嘱地方政府，救济粮不用钱买，也不用搭杂粮。

在新州镇夏家山，只找到了夏中华儿子夏兴元的居所，却始终没有找到夏兴忠房屋，或者圈舍之类的。那夏兴忠人又在何方呢？上坝茶场的场长欧建学带路，我们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里找到了他——夏兴忠！

夏兴忠，今年58岁，他是红军的后代。

1976年，夏兴忠就来到了上坝茶场接受劳动再教育。已经木讷的夏兴忠一家人现在一直居住在年久失修的知青房里。因为茶场的领导很关照他，想尽办法，还是给他家眷了一间煤房作住房。这一来，他家就有了一间厨房和一间“卧室”，虽然每间只有十来平方米，但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他家的居住条件相对算是优越的了。

现在他每天早出晚归，一天能挣二十六块钱的工资。他和老伴出去找活干，孩子夏林就独个留在家，因一个孩子独自在家里呆惯了，自然也就不会到处乱跑，况且从小

就孤独的孩子，要他跑，他还没那个胆子。再加上通往上坝村的泥巴公路上又没有多少车辆经过，大人们自然更放心了。

但也可以换一句话说，能不放心吗！

夏兴忠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过的，春天和夏天的日子要好过些，最难捱的是秋天和冬天。一进秋天，上坝茶场就是天寒地冻，他连找个地方出卖劳力也都成问题，一家人就蜷在家里干耗着。即使是冷得不得行，也没钱买煤取暖，一百斤煤要十七块钱，这十七块钱毕竟不是小数字。一百斤煤也就那么三五天就烧光了，要靠煤火取暖，就显得很奢侈了。所以，每天的那两顿饭，靠捡柴火来煮，也就不足为怪了。

农村有句大白话叫做“背时的人是喝口米汤都要遭噎”。虽然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眼里，夏兴忠不算是个农民，至于“背时”这话也不敢说，但他的确给“喝米汤都给噎了”。

夏兴忠的前妻是跟有钱人偷偷跑的，还留下了一个带残疾的儿子叫夏伟。夏伟是在班竹乡中学读初一时，耳朵忽然失聪带上残疾的，从此，夏伟就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这是一个大晴天打下炸雷。这个突来的灾难让夏兴忠夫妇没法接受，再加上当时的生活早已贫困潦倒，无奈之余，夏兴忠的妻子撇下丈夫和孩子，独自寻找自己的生活去了。

为了求生存，夏伟只好到广东番禺打工，寻找生活出路。夏伟已经24岁了，一直在外打工，夏兴忠说，也不知他在番禺那边过得怎么样。

现实再残酷，还得接受。日子再难过，还得过。夏兴忠又娶了本地的姑娘做媳妇，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终于盼来的第二个儿子——夏林。可这时候的夏兴忠已经是54岁的人了。媳妇48岁。

也不知能不能把孩子拖出头。夏兴忠和他的媳妇总是这样担心着。

两年前，上坝茶场的茶园承包给浙江老板经营，夏兴忠又不得不继续贩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去给浙江老板打工，维持生计。

现实并不因为他生活的无奈而给予夏兴忠额外的关照，而是在他最不幸的时候，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这次，他算是彻底的跌倒了。

浙江老板承包了茶场后，采茶用的是机

器采摘。一台采茶机需要三个人才能操作。他人老了，没得劳力，抱不动机器，也跑不赢机器，只好负责操作风带。2007年8月29日中午，天气有点热，他穿着短袖衬衫去采茶。他害怕风带搅着光手膀子，自然就离风带要远些，哪晓得那采茶机加油一猛，就跑快了，他就被采茶机攥在了一仰八叉，栽得手膀子和腰杆动弹不得。他本来可以到班竹乡卫生院去检查上药的，可要走七公里多的山路，根本就走不去乡卫生院。他知道，茶场附近没得医院，所幸的是在一口烂篾箱里翻到了两张买了很久的膏药，他就将就的贴了了事。

夏兴忠在上坝茶场打工也没有签什么用工合同，他总是样认为，只要别人家不嫌他老，还继续给他一个出卖劳力的地方和机会就已经不错了，以至于自己受了伤，也只得抱着肚子干挨着。

采访夏兴忠的那天，他已经在家休养了三天。他连自己动手煮饭都成问题，每天都要等在整村扶贫移民搬迁工地上煮饭挣钱的妻子，把工地上煮饭洗碗的活全忙完后，才回家煮饭给他吃。

因天气影响，夏兴忠一年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在茶园打工，收入也只剩一千五百块钱，这也算是收入较高的了知青家庭了。

夏兴忠说，要是自己年轻点，还可以出去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可如今自己已经是要满六十岁的人了，出去卖力气，哪个敢要哇！

他也曾到过正安县城，想托老同学找活干，可见了当年的同班同学，相互虽然认得，可根本就不理睬他，连打个招呼也都害。这很让他伤心了一阵子。但他还是想得开，说这也不奇怪，毕竟自己穷了这么多年，一幅穷酸像，谁愿意正眼看你哟。

一说起这些，就勾起夏兴忠无尽的回忆。

1971年，他初中刚毕业，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参加考试去教书。因家庭情况特殊，他不能去。于是他就去桐梓县当民兵，可回来后，还是不能安排正式的工作。于是，他又参加了正安境内的良坎电站建设。不幸的事在修建良坎电站的时候又发生了——他的手给受伤了，终身带上了残疾。虽然当时政府就给他办理了伤残鉴定手续，可他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养

活自己。后来，他又去一家煤矿挖煤，因一只手既不能挖煤，也推不动机动车运煤，就只好一挑一挑的挑煤，靠挣小钱过活。

手没带上残疾的时候都没有安排到正式的工作，手带上残疾了要想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有点痴人说梦了。这个时候，他想到去插队当知青后，就可以安排一份正式的工作。他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就找到了组织，要求去就受劳动再教育。

他拿到了组织把他安排到“国营上坝农场”当知青的介绍信，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大清早，他就和饶国荣一道，怀揣着组织开的介绍信，带上平时洗换的衣服和被条，从县城出发了。毕竟这是去报到上班，心情好得很。路上，他哼曲子，饶国荣比划手势，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那么几句，反复的唱，越唱越有劲，早饭时间还不到，就走到了格林区（现在的格林镇）。

凭介绍信，他俩在格林区食堂吃过了早饭后，就沿着格林到班竹的山间小路，小心翼翼地上一坡又下一坡。路边的猫爪刺把衣服抓破了，马尔干草把手膀子割出了血，石头撞崴了脚趾甲……这些，他好像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只顾着擦汗，哼歌，赶路。足足走了四个小时，才走到了班竹。

刚到班竹，一辆由上坝茶场派来专程迎接知青的“27型”拖拉机早已等候多时。车上拉起欢迎知青的大幅标语，先来一步的知青敲着锣鼓，唱着歌前来迎接。

他急忙把背包搬上了车。柴油机发出的一阵阵嗒嗒嗒嗒，嗒嗒嗒嗒轰鸣声湮灭了前来迎接的知青们的欢歌。屁股还没座热，一拖拉机就把他俩拉到了国营上坝茶场的办公楼前。

刚到茶场的那些日子是他这一辈子最快乐日子。不只是人年轻，精神好，更关键的是组织考虑的周到，没有把他安排在生产第一线，而是安排他当队长，属于管理层。这对于手带残疾的夏兴忠来说，简直是前世修来的佛。

只是这佛修来的时间不长，茶场不景气了，夏兴忠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然，别的

知青也不例外。

艰难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夏兴忠总有一种永远也找不回来的失落感。他说，一道来当知青的和新州老家后来才来当知青的，都回去了不少，有的还在县城弄到了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已经是“钉也没得，板也没得，仅有就是一副多种高寒病症综合的躯体”。这么多年了，找的钱连养家糊口也弄得紧巴巴的，这日何时是个尽头了。

夏兴忠在上坝茶场主管过茶叶生产，他也认真总结过上坝茶场走到今天的这种境地中的无奈。他说，茶场效益好的时候，别人生产一斤上好的茶叶要卖几百块钱，而他们场里生产同样的一斤茶才卖几块钱，一个致命的因素就是他们茶场没有创出品牌，注册一个商标需要七万多块钱，不是不想弄个自己的品牌，不是不想注册自己的商标，只是不知去哪里才弄得到那么多钱。

在茶场干了三十多年了，夏兴忠连一次电视都没有看过。虽然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也有极少部分买了电视，他本来可以去别的知青家看电视，了解茶场外面的世界，但他没去，从来没去过。他说，不只是他一个人才是这样，不去有电视的知青家看电视，大凡条件与他相差无几的知青都这样。原因只有一个——穷。大家都穷，穷得害怕，穷进了骨子，以至于连你到我家来吹牛，我到你家去聊天，都觉得很没脸面，很丢人。

上坝茶场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也没有书报可读。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玩扑克、输小钱，或偶尔有一两个臭味相同的在一起杀两局象棋。夏兴忠就是其中的一位以杀象棋打发无聊的留守知青之一。老知青们见他无聊、落魄的样子，也曾叫 he 一起玩两把扑克，可他说兜里没得钱，打不起牌。就这样，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一个人窝在家里。有一名老知青一直和他的关系不错，偶尔也来他家杀两局象棋，或闲吹几句。但这种机会极少。

他现在已经思想很不合群留守知青之一。上坝茶场的领导考虑到他这样生活下去，迟早要出问题。

2003 年，上坝茶场的领导就安排他与别

的三名老知青一道，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要他们四人一道坐车到安场，一方面可以找别的事做，改变生活的困境。另一方面还可以与外界接触，希望在思想观念上有所变化。可他没有座上坝茶场领导安排的吉普车，而是座了一辆摩托车，独自就到安场去了。

他来到安场，始终觉得外界的生活境况与他格格不入。他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观念没有改变，也没找到合适的事做，最终还是回到了留下自己苦涩记忆的上坝茶场。

冬天的上坝茶场风雪特大，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也就没有什么活可做，生活也就越来越清淡。这个时候，到县城来卖煤球、擦皮靴、捡垃圾、背背篋、拉板板车等成了他们的首选。当然，这指的是身体状况较好的部分知青，至于体弱多病的那部分知青，就是干这样的体力活也成了泡影。诚然，这也包括夏兴忠在内。

一到冬天，夏兴忠还是准时带着妻子和孩子回正安县城。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夏兴忠回到县城，不是找活干，也不是专程来接受外界的新鲜事物，更不是来服侍母亲，而是回来将就母亲每月的五百块钱养老金，把一年中最艰难的日子熬过。这日子要一直熬到开春后，上坝茶场有活干了才结束。

这很像现代社会流行“啃老”。但夏兴忠不是。

夏兴忠和他母亲住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的地方没得，就将就着睡沙发和凉板床。他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作为老红军的遗孀，每月有五百块钱的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

说起这些，他内心的酸痛就一丝丝爬上了额头，目光是那样的呆滞和无奈。

夏兴忠说，他这一辈子就已经算了，但令他不安的是他没法给孩子夏林创造条件。哪怕就读几天书的条件也好。

夏林已经五岁了，也该开始接受学前教育了。

夏兴忠给夏林买的新书包一直挂在墙壁上，已经上灰了都没有背过一本书，哪怕是一支断了的铅笔都没有装过。因为上坝茶场的子弟学校——茶园小学办垮了，上坝茶场的孩子要走三公里远的山路才有学校，又没

有人接送，夏林也只好留在家里，玩他唯一的玩具——小卡车。夏兴忠毫无表情地说，这玩具小卡车是他一次来正安县城，在王尔嘴的垃圾场里捡的。

现在夏兴忠唯一的想法是回正安县城，带孩子读书。但一想到自己没得关系，找不到接受的单位，又加上不敢在县城居住——他知道，城里的人际关系不如上坝茶场好处，城里人来人往的花销特别大，哪怕是一般关系，吃个生期酒拿五十块钱也都小气得很，要是在茶场，十块钱吃一次生期酒或者出嫁酒，也还大方得很。所以，他又犹豫了。他害怕了。他彷徨了。

他的年纪最大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帅仕银一会儿说自己72岁，一会儿又说自己76岁，而上坝茶场的领导介绍他今年63岁！

63岁，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他的年纪最大。

帅仕银到上坝茶场来已经近四十年了，不管怎么说，这近四十年的蹉跎岁月是他一个孤零零的走过来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假。还不包括来上坝之前那段孤苦伶仃的苦难岁月。

古代的君主习惯谦称自己为孤，或者寡人。而“孤”字在现在所指的是那些脱离群众，孤立无助的人。

所以，帅仕银应该是属于后者，属于无法融进群众，孤苦无助的人。

为帮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这位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的最年长者，这不得不使我再次推开了帅仕银暂居的那间教师宿舍门。

推开门，三块水泥砖随便镶成的一个半“工”字形灶台放在了门的正对面。砖缝也没有用泥巴或者水泥砂浆糊，铁锅儿放在上面，就做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近似于我儿时做“客客饭”用的“灶台”，但这是帅仕银煮饭吃的灶台。

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了，帅仕银总算起了床。他正在煮早餐吃。

帅仕银满头花发，满脸的胡子把脸膛映得特别小。很显然，他的胡子已经有几个月没刮过了。他牙齿掉了不少，只剩下光光的牙龈。他穿着黄色的制服，破旧，湿漉漉的，

已经长时间没有洗过。

帅仕银是饿了才起床的，因为这个时候该煮早饭吃了。

一把柴火加进去，满屋都是烟子（本来说满屋这个字眼是最不恰当的，因为这间屋子只有几个平方，并且还用半壁砖头隔成了卧室和厨房，说满屋子其实是夸大其词了），柴火灰直往铁锅儿里钻，往水泥砖“灶台”上扑……锅儿里的面条煮熟了，足足有大半锅儿面条。面条里没有放酱油，也没有放味精，更没有洒葱花之类的佐料，仅有的就是几颗油珠儿伴着大一块小一块青海椒皮在锅里打漂漂儿……

帅仕银端着一大土巴碗面条，呼噜呼噜的吃得有滋有味，时不时的有些半截面条从他的嘴里掉到地上。他也用不着把掉在地上的面条捡起来，因为还有两张嘴巴已经守候得直流口水。也用不着他招唤，那两张嘴巴，他的两个小伙伴——两只才满双月的小狗——准会过来吃得舔口擦嘴的。因为他的两个小伙伴仅靠吃掉地上的那几截面条显然吃不饱，以至于吃了还想吃，不肯离开，所以始终靠在他的脚背上赶都赶不走。所以，帅仕银每次煮面条吃都要多煮一些，锅里现在还剩下一大土巴碗面条就是给那两张嘴巴煮的。

帅仕银居住在上坝茶场的子弟学校的一间教师宿舍里。屋里搞得乱糟糟的，煮面条吃的柴火随便甩在地上，锅碗瓢盆东一样西一样倒放着，斜放着，乱丢着。摆得最整齐的要数那三块木板和几块砖头搭成的“碗柜”下面的空啤酒瓶子，和上面的装苞谷烧酒用的塑料罐。

我在走访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得知，帅仕银在留守的知青部落中，是一位喝酒有海量角色。留守的知哥知姐们评价他的酒量，要是用在现在的社交应酬，说不定还能促成很多项目落成呢！他自己也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现在他除了每天的早餐吃面条外，中餐和晚餐吃的都是酒，以至于到他的“家”里很难找到大米之类的东西也不觉得奇怪。这个地方要顺便交待一句的是我之所以要把那个家字加双引号，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就没要找到过媳妇，所以他的家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家。

帅仕银来上坝茶场已经四十年了。但要他说具体是哪年上来的，他从来没有说清楚

过，唯一记得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帅仕银的老家就在班竹乡的旦坪村，离上坝茶场很近。他是一个人来上坝茶场的。后来，旦坪也上来了一些知青，但都回去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人，孤零零的与两张小嘴巴相伴。

帅仕银在旦坪的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他的哥哥和弟弟早已不再人世。他的父母亲也早就离他而去。

帅仕银在来上坝茶场之前，他的弟弟就死了，因死得早，就连自己的弟弟叫什么名字他也记不起。他哥哥帅仕红死的时候他已经大记得了。帅仕红是到桐梓县当工人，不到三个月就生病了。去医院检查，花了一万多块钱的医药费，连个病因都没有查出来就出了院。找人抬回老家后，在床上睡了两个多月才慢慢的死去的。

他的哥死后不久，他唯一的侄儿在十三岁的时候也生病死了。这个时候，帅仕红的媳妇，帅仕银的嫂嫂也了无牵挂，有的仅仅是痛失丈夫和孩子后，难以愈合的心灵悲痛。

不久，帅仕银的嫂嫂改嫁到宋家。不幸的是他的嫂嫂改嫁后，在给宋家添孩子的时候，死于非命。

帅仕银成了特殊意义上的“孤家寡人”。生产队的人都可怜他。生产队队长就主动与上坝茶场（当时还是农场）领导协调，虽然帅仕银大字不识一个，但还是像当时的知青上山下乡那样，光荣的应征“入伍”了。

来到上坝茶场，他一直在一线从事生产劳动，一个月可以挣十多块钱的工钱。种苞谷，栽水稻，他都很在行。农场开始大规模开荒种茶的时候，他又加入了种茶的队伍。他现在都还记得，当时他们五个人开垦的百多亩荒地，种了些什么。包括在现在哪个位置他都记得。开荒种茶告了一个段落，他又开始放绵羊。茶园开始投产了，他又到加工房炒茶青。

从荒地上种出郁郁葱葱的茶园投产，到茶园进入老龄期，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可这二十多年来，他的工资每月就只有一两百块钱。一直到退休，他拿的还是这个数。还不如他退休后，每月拿到的养老金多。

帅仕银曾经放过绵羊。

一说起放绵羊的事，一丝不经意的喜悦

在帅仕银的右眼眶里打了个转儿，就不见了，一下子就转为了悲痛。

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就放过绵羊。

那时候是在格林放绵羊。那个时候也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每天邀约同年的伙伴们，把绵羊追到山坡上去后，就开始尽情的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把羊子甩在一边，自顾自的玩扑克，打跳，爬树，累了困了就在地上躺一会。饿了嘴馋了，就出歪点子，坏主意，抠别人的红苕吃，偷别人花生吃，就连还未收浆的玉米糊糊也啃过……

正因为他放过羊，他的童年生活也因此烙下深深的伤痕。那是一年的年关，放羊的伙伴都回家过年去了，他却留了下来。上百头羊子就他一个人赶着放。因冬天羊子找不到东西吃，老是乱跑，他怕把羊子给跑丢了，就使劲的甩着鞭子赶羊，因甩急了忽然收回来，那鞭头正好打在了他的右眼球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让他失去了知觉，滚了一大坡土坎。

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右眼却睁不开了。

帅仕银在格林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好转，就转院到正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因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他的右眼从此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失去了右眼，但医疗费还得拿。当时花了一千多块钱的医药费，其中有八百块钱就是自己放羊子挣来的工钱。

童年留下了残疾，少年孤苦伶仃。以至于他来到上坝茶场都四十年了，每年的春节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喝闷酒度过的。

他不会串门，不会吹牛，来到上坝茶场后，只知道天一亮就要吃饭干活，天一黑就要上床睡觉……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成了抱土烟杆的老汉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辈子连一个谈对象的机会他都没有抓住过。哪怕是牵一牵自己单相思的女人的手都行。但他等了一辈子，都未曾有过。

开始时，姑娘嫌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不方便。后来，又嫌他穷。再后来是嫌他老，最后是嫌他麻木了，糊涂了……

冬天，他就靠烧煤球和木柴禾取暖，实在冷得受不了，就白天晚上都蜷成一团，一

直蜷在被窝里。

他本来可以回老家旦坪度晚年。在老家，他还有两间木房子，至今还保存着，只要他回去，乡亲们也愿意拿点菜园子地给他耕种。可他太痴情了，想一辈子都留守上坝茶场，蜗居上坝茶场，默默的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他至今都还记得，活了那么大一把年纪，仅仅去过一次正安县城，就是那次去正安县人民医院医眼睛，所以正安县城留给他的印象，永远是几十年前的那个模样，永远是那么美好。

退休了，帅仕银每月有五百块钱的养老金。他的日子是一天一天扳着手指头数着过的，因为他每个月的开销算得明明白白：

每天两瓶啤酒，六块钱，一个月要一百八十块钱；

每天两斤白酒，五块钱，一个月要一百五十块钱；

每天吃一斤面条，一块三角钱，一个月要三十九块钱；

每天烧三个煤球，九角钱，一个月二十七块钱；

两个月秤一次肉，一次秤十五六斤，一个月平摊七八十块钱；

.....

帅仕银很少买米煮饭吃，每天都是靠酒精分子硬撑着。虽然留守上坝茶场知青们说他喝酒的工龄已经和他当知青的历史一样长，但碰到他去茶场的小卖部买酒时，都少不了要劝他几句，要他少吃点酒，说酒喝多了伤身体。只是说的时候他满口答应，可一回屋子里，他又“今朝有酒今朝醉”，“莫让金樽空对月”了。

开始领养老金了，帅仕银一个月下来还有几十块钱的结余。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和他套近乎。如今，他结余下来的也有一千多块钱，可是那一千多块钱到底装进了哪些人的裤兜里，哪个裤兜里装了多少，他却全都不知道。

当然，帅仕银的那一千多块钱，没有被别人偷，也没有被别人抢，而是借给了那些在上坝茶场没法生活下去，去广东当工人的知青们做车费了。

生活寂寞了，他想起了养狗做伴；生活糊涂了，他觉得养狗比交朋友靠着；难得糊涂

了，他想起了养狗是一种很有涵养生活方式。

帅仕银每两年就要更换一次“小伙伴”。当“小伙伴”两岁的时候，他就把它们给宰了，在那三块水泥砖搭成的灶台上，一锅给清炖了吃，连汤也不剩一丁点儿。就这样喂大了杀来吃，杀了来吃了再喂。这也很有兴致的，打发着生活中的孤苦与寂寞，残酷与煎熬，痛苦与无奈。

从上坝茶场到正安县城有一百多里路，前些时候要十五块钱的车费，现在要二十块钱的车费。这些，帅仕银记得清清楚楚。

帅仕银记得清楚地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有一个心愿一直藏在帅仕银的心窝里——要是哪天能够到正安县城去看一看，走一走，这一辈子他也就知足了！

他说。

他放了媳妇一马

1977年7月，年轻的帅小伙罗建中在正安一中念完了高中。

那年，他才18岁。

那年，他来到了上坝茶场。

罗建中从小在正安县城长大，童年生活充满了阳光。正因为他是城里人，所以罗建中不得不远离正安县城杨柳巷的那个家，到广阔的农村去，接受劳动再教育。

一切都收拾好了，他还特地到农贸市场买了一双解放鞋和洗漱工具。当天晚上就打好了背包后，上坝茶场那“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丽画面，搅得他一夜没睡好觉——因为太兴奋了。

大清早，罗建中打起背包，提着洋瓷盆，背着水壶，带着家人的叮嘱，一个人来到了县农业局门口。

一辆解放牌汽车已等候多时，前往上坝茶场的知青曾祥文、王真容（女）、龙延丽（女）、刘志芬（女）等一共六人，已经上了车，就差他了。

解放牌汽车吐吐的出发了。

解放牌汽车的轮胎始终转得不快。经土坪、流渡，汽车就在山间公路上摇摇晃晃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太阳下山了，他们才饿着肚子来到中观。罗建中至今都还记得，当时到中